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RONALD INGLEHART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 著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严挺 / 译 祁玲玲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RONALD INGLEHART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 著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严挺 / 译 祁玲玲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
(美) 英格尔哈特 (Inglehar, R.) 著; 严挺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7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ISBN 978-7-5097-4798-8

I. ①现… II. ①英… ②严… III. ①现代化研究—
世界 IV. ①F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2359 号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 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

著 者 /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译 者 / 严 挺
校 者 / 祁玲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姚冬梅

责任校对 / 师军革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798-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1-163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 元

印 张 / 37.5

字 数 / 533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Inglehart, Ronald.

Copyright © 1997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 William Street, Princeton, New Jersey
08540

In the United Kingd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ichester, West Sussex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年版译出

总 序

丛日云 卢春龙

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政治学中最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也是成果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包括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态度等。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间的一种特殊分布”，是“内化于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英格尔哈特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与一个群体或社会流行的政治信念（beliefs）、规范（norms）和价值相关的所有政治活动”。

政治文化是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在寻找政治因果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解释变量。因而，在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英格尔哈特在追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时，曾列举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和成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阿道尔诺的《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拉斯韦尔的《民主性格》（*Democratic Character*）、斯托弗的《共产主义、一致性与公民自由》（*Communism, Conformity & Civil Liberties: A Cross Section of the Nation Speaks Its Mind*）、罗基奇的《开放和封闭的精神——对信仰和人格系统性质的调查》（*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and personality systems*）等。此外，一些学者还将马克思·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列入其中。与当代科学化的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研究相比，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被视为“非科学的”，但也有其重要价值。在中国，自19世纪末起，学者们在讨论中西文化关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时，也大量涉及政治文化的内容。

布林特教授曾区分和全面梳理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谱系，即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以及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开始于孟德斯鸠，经过卢梭、斯戴尔、贡斯当、基佐以及托克维尔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从社会宏观背景的差异去理解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进而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开始于康德，经过赫尔德、洪堡、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解释学的传统，强调政治文化并不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的抽象反映，而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象征、图腾长期积累的产物，强调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由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开始于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开创性研究，这一谱系主张通过实证的、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文化，从而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弊端，他们在方法论上主张以对各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调查为基础，进而对各国的政治文化进行精确的科学测量。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为主流。1956年阿尔蒙德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1963年他又与维巴合作出版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此为当代科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亦即跨民族的抽样数据研究的开端。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派伊的《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斯里德曼的《人格与民主政治》（*Pers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英格尔哈特的《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本菲尔德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等。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和挑战，许多学者批评它保守、静止、简单，存在文化偏见和文化决定主义倾向，低估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政治文化研究一度走向衰落，退居政治学的边缘。但是，从 80 年代起，政治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回归”到“复兴”进而走向繁荣的过程。英格尔哈特在 1988 年最早使用了“政治文化的复兴”这一概念，而后，H. J. 威尔达、阿尔蒙德和布林特等人也肯定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到来。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大批有影响、有重大原创性贡献的成果问世：英格尔哈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人类发展时序》（*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与维尔泽合著），英格尔斯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尤斯拉纳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普特南的《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布林特的《政治文化的谱系》（*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狄百瑞的《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达尔蒙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等。

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政治系统的内在心理层面，强调政治文化是决定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支配其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政治文化对于了解一个国家正式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行为，理解历史上一个国家特殊的发展模式，都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政治文化研究还特别与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研究有密切关系，它与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国际环

境、政治战略、政治精英等一起，构成解释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与模式的重要的自主性变量。

政治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独特的文明，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化单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在当代社会政治转型时期，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发生了何种变化？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对于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公民文化建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需要当代学者作出科学的调查和分析。只有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的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了然于胸，才能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道路选择，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型。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仍然以学者的观察、粗糙的文献分析为主要手段，以对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性研究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虽然富于学理性和启发性，但是，没有科学的量化数据为基础，也缺少实际操作性，尚不足以为当前政治改革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为了推动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理论和经验，也需要直接引进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学界许多人都在谈论政治文化，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只有零星的译介，大量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对于国内学者来说还是陌生的。这是国内政治文化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我们编译了这套《政治文化研究译丛》，希望为国内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政治文化研究，推动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走向繁荣，贡献出一批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性相称的研究成果。

西方和中国民众的价值观转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崛起（1970 ~ 2007 年）

（中文版序）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严挺 丛日云/译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部作品——《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1990 年）和《现代化与后现代化》（1997 年）——在首次出版发行时即预测，北美、西欧、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工业社会的民众将出现一些重要的基本价值观转变。距此预测已经过去足够长的时间，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可以检验这个预测是否已经应验了。正如本序言的论据所揭示的，几乎所有本书预测的转变都已发生。解释这些转变的理论不仅适用于西方国家，因为它揭示出，转变会发生在任何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确，预测的转变看来既已出现在西方国家，也发生在日本和韩国。

中国尚未发展到其多数人口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视生存为不成问题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尚未进入后现代价值观开始主导较年轻人群的阶段。但是，在过去 30 多年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我写下这些话时，使用的电脑就是中国制造的）。如果我的理论正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将经历代际价值观转变的过程，较年轻的群体将比他们的长辈更明显倾向于性别平等，宽容外来群体，以及更重视言论自由。预测总有其不确定性，但是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当一个社会越是达到较高的经济安全和教育水平时，某些特定的转变就越有可能发生。

40 多年前，我提出，“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可能正在经历一场

转型。它似乎正在改变特定几代人的优先价值观，因为条件的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基本社会化过程”（Inglehart, 1971: 991）。西欧六国的调查证据解释了年轻群体和年老群体之间的巨大优先价值观差异。在较年老的几代人中，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当我们从年老群体转到较年轻群体时，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广泛。差异是明显的。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群中，物质主义者是后物质主义者的足足 12 倍。而“二战”后出生的人群中（1970 年时为 25 周岁以下），后物质主义者数量则略微超过物质主义者。

如果像我阐述的，这些与年龄相关的差异反映的是代际价值观转变，而不只是人们由于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物质主义，那么我们预期会发现，随着较年轻的群体在成年人口中替代较年老的群体，会有一个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逐渐转变。其中的意义是深远的。这些价值观是与一系列重要取向有着紧密联系的，从强调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到支持新议题和新类型政党。

代际价值观转变从本质上讲是进展缓慢的。但是其长期效应是深刻的。自发表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理论假设以来，40 多年过去了，那么预测的转变是否已实际发生了呢？

我提出的理论的含义是清楚的，即认为，随着人们开始越来越强调自主、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就出现了。这种转变与生存条件的改变有关——首先就是，先前，人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生存的安全感，后来转变为在成长过程中视生存为不成问题。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生存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直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二战”后出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伴随福利国家的兴起，带来了发达工业社会生存状况的根本性的改变。战后新生代在成长阶段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福利国家制度进一步加强了生存有保障的感觉，从而造成了年老群体和年轻群体在优先目标上的重大差异。随着 20 年后战后第一代开始发生政治影响，上述差异明显地浮现出来。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大量的证据显示，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优先价值观的代际转变已然发生。而它仅是更广泛的、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文化转型的一部分，这场转型将新的政治议题推向政治舞台中心并成为新政治运动的动力。

代际价值观转变的理论基于两个关键假设（英格尔哈特，1977）：

匮乏假设。几乎所有人都渴求自由和自主，但是人们都倾向于赋予最紧迫的需求以最高的价值。物质必需品和人身安全直接与生存相关，一旦这些东西匮乏，人们就会将这些“物质主义”目标放在首位。但是在富裕条件下，人们则更可能强调诸如归属感、尊重、审美和知识需求之类的“后物质主义”目标。

社会化假设。物质条件和优先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不是能够即时调整的。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未成年阶段的生活条件，并且价值观的转变主要是通过代际的人口更替实现的。

匮乏假设类似于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它反映了生存和安全类的物质需求与诸如自我表现和审美满足之类的非物质需求之间的基本区分。

在过去几十年中，发达工业社会已经与历史上的主导模式极为不同：它们中的大部分人口不是在饥饿和经济不安全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就带来了一种渐进的转变，即归属感、尊重、知识和自我表现的需求变得更为突出。匮乏假设表明，持久的高度繁荣期往往会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而长期的经济衰退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这两个假设可推导出一些对价值观转变的预测。首先，匮乏假设说明，繁荣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社会化假设则表明，基本价值观的转变是渐进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发生伴随着较年轻的群体在成年人口中替代较年老的群体。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和人身安全的改善之后，我们会发现，年轻群体与年老群体之间在优先价值观上的实质性的差异，因为他们在成长期有着不同的经历。不过，经济变化与其政治效果之间会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滞后，因为从繁荣期开始算的15年或20年后，在该繁荣期中长大成人的年龄群体才开始成为选民。

对造成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目标转变的条件而言，人均收入和受

教育程度是现有的最佳指标，但从理论上说，关键因素不是人均收入本身，而是一个人的生存安全感。它意味着特定社会的社会安全体系能够成为经济影响与人身安全之间的中介。

为检验价值观转变的理论假设，我们询问了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目标，让人们在下面两组目标中进行选择。一组包括经济增长、抑制物价飞涨、维持秩序和打击犯罪等目标，代表着物质主义优先目标；另一组是言论自由、在政府重要决策中有更多话语权、在工作中有更多话语权和重视社会中的理念等目标，代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1970 年对西欧六国的代表性国家的调查显示，所有这些国家中年轻和年老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值观差异。正如图 1 所示，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群中，物质主义优先价值观的秉持者超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秉持者，两者比率大于 12:1。但是如果我们从较年老的群体转向较年轻的群体，对比就发生了变化，趋势是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下降和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上升。在最年轻的群体（1970 年为 18~25 岁）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数量超过了物质主义者。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年龄群体的优先价值观是稳定的，那么可以推导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即最年老的两个群体也只有二三十岁的时候，上述国家的成人人口中物质主义者数量肯定远远超过后物质主义者，比率至少是 10:1。但图 1 的截面证据也暗示，1970 后的 40 年内，随着最老的四个年龄群体消亡，后物质主义者的数量会与物质主义者的数量不相上下，我们应该能观察到支配这些国家的动力的重大转变，它将导致人们从重视经济议题转向日益重视生活质量和自我表现的议题。

但问题是，这些价值观差异是稳定的吗？上述与年龄有关的差异反映的是持久的年龄群体效应还是短暂的生命周期效应？如果只有一个时间点上的数据，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而且两种诠释有着十分不同的含义。生命周期的解读意味着，年轻人会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日趋物质主义化，以至于当他们 65 岁的时候就会变得和 1970 年的 65 岁人群一样的物质主义，进而意味着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不会有所改变。而年龄群体效应的诠释则表明，较年轻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会保持相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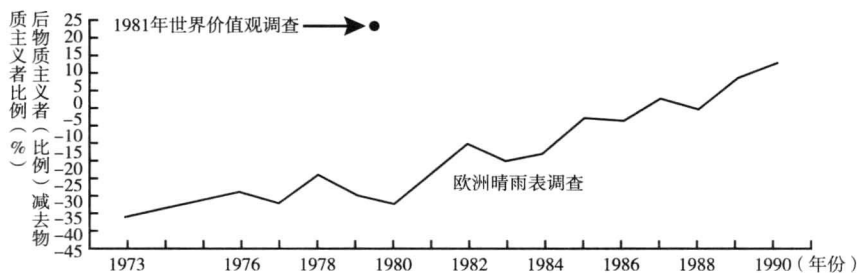


图1 1970年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民众中价值观类型与年龄群体的关系

资料来源：1970年2月的欧共体调查。基于最初的四项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问题组。摘自英格尔哈特（1990：76）。

后物质主义属性，随着他们取代较年老的、物质主义程度较高的群体，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群组分析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权威方法。它需要：①涵盖较长时段的调查数据；②在数个时间点上进行的调查，以区分阶段效应与生命周期效应和年龄群体效应；③每个调查都有大批的受访者，因为如果我们将单个国家的样本人群分割成六个或七个年龄群体，抽样误差范围会扩大到噪声盖过信号的程度。

图2显示了群组分析的结果，对相关年龄群体的跟踪研究达近40年。^[1]该图汇总了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的数据，用以建立大样本并得到特定时间点上各年龄群体位置的较稳定估值——由后物质主义者比例减去物质主义者比例计算得出。因此，图2中纵轴上的零点表示两者数量相等，往上则后物质主义者比例增加而往下则物质主义者比例增加。

如果图1中与年龄相关的差异反映的是一种生命周期效应，那么每

[1] 样本进行了加权，以反映各国的人口。因为2006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没有包括比利时，我们在汇总分析中采用了1999年的比利时调查数据。这样做会减少1999~2006年观测到的转变量，但鉴于比利时只占六国总人口的4%，造成的偏离应是很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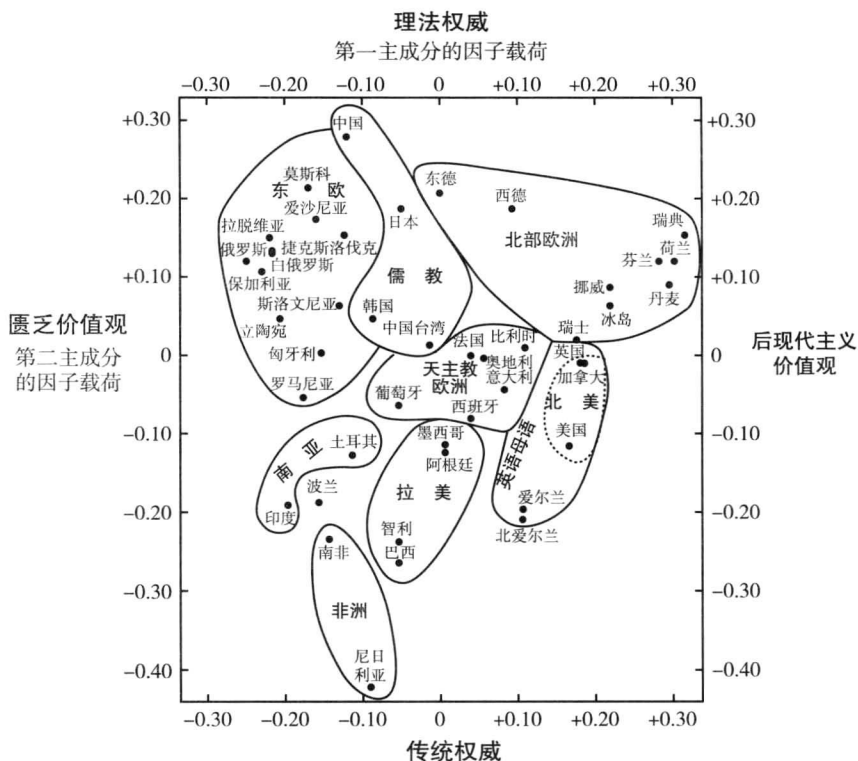


图2 根据出生年份划分的，西欧六国中后物质主义者比例
减去物质主义者比例之差 (1970/1971 - 2008/2009)

资料来源：1970/1971 ~ 1997 年的结果基于欧洲晴雨表调查。1997 年、2006 年和 2008 ~ 2009 年的结果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研究项目。基于经过加权处于的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的样本。

一条年龄群体曲线都会有朝向物质主义一端的下行趋势，即如果我们从图 2 的 1970 年横向看到 2008 年时，每个年龄群体都会变得更物质主义。如果与年龄相关的差异反映的是稳定的年龄群体效应，模式则会是水平曲线，即从时间序列的开始到结束，每个年龄群体保持着大致相同的后物质主义程度。

但是我们还需要将阶段效应考虑在内。我们的理论揭示出，负面的短期效应，如经济大衰退，将会推动所有的年龄群体曲线因对即时情况



作出反应而下降；而随着经济复苏，它们又会恢复到先前的水平。这样一来，从长远看它们就会大致保持其后物质主义的起始水平不变。而从短期看，推动所有年龄群体曲线下降的阶段效应会给人以错觉，即与年龄相关的差异反映的是生命周期效应。但是从长远看，正向或者负向的波动会相互抵消。

我们的数据采集自很多个时间点，所以阶段效应清晰地呈现出来。它们反映了即时的经济条件，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水平。但是阶段效应的作用不会持久。较年轻的群体尽管有短期的波动，但还是保持了相对后物质主义的特征，并且在整个 38 年的阶段中，我们没有发现特定年龄群体随年纪增长而变得更物质主义这种总体趋势。

不过，在这 38 年的时间跨度中，三个最年老的群体退出了样本人群。首先是 1886~1905 年间出生的群体，接着是 1906~1915 年间出生的群体，最后是 1916~1925 年出生的群体。因为这些群体中仍然在世的成员数已变得太少以至于无法给出可靠的估计值。它们被三个新群体所代替，分别出生在 1956~1965 年间，1966~1975 年间以及最近的 1976~1985 年间。虽然 1956~1965 年间出生的群体明显地比 1946~1955 年出生的群体更后物质主义（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 1956~1965 年群体的成长阶段比战后第一代更安全），但是两个最年轻的群体不是。西欧的经济安全水平在过去 20 年内并没有继续上升。尽管有些许的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不断上升，使得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不大或者没有增长。福利国家支出的削减和高失业率进一步冲击了经济安全，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因此，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两个最年轻群体的后物质主义程度看上去要略低于前面的两个群体。它们的差异很小，所有四个战后出生的年龄群体都基本处在相同的位点上，即纵轴刻度的 +5 分值。这反映出，后物质主义者数目超过了物质主义者但比差很小。相对而言，两个战前出生的群体依然表现出不同，物质主义者数目依然超过后物质主义者。在接下去的 20 年内，两个战前出生的群体将会退出样本，而代际人口更替将继续促进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逐渐转变，但随后（除非出现生存安全问题上升这种反弹情况）代际转变

会结束。现在，最年老的群体和最年轻的群体之间的价值观鸿沟，与时序数据起始的 1970 年时相比，已经缩短了不止一半。

图 2 的群组分析没有显现出任何生命周期效应的迹象。38 年时序数据提供的证据清晰地表明，1970 年发现的与年龄相关的差异反映的是持久性的群体差异。这也意味着，随着较年轻、物质主义程度较低的年龄群体在成人人口中替代较年老的群体，这些社会会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这恰恰是已经发生的情况。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如将上述 6 个西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看，物质主义者数目是后物质主义者的 4 倍，在最年老年体中是 21 倍。与之相似，在美国，物质主义者是后物质主义者的 3 倍。在接下来的 38 年里，重大的转变出现了。截至 2008 年，西欧的后物质主义者在数量上已经略超物质主义者，在美国，前者是后者的 2 倍。尽管出现了大幅的短期波动以及最近几年不利的经济状况，预测中的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依然发生了。

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势头在 1970 年首次调查的西欧六国中已经开始逐渐减弱，但是对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而言，这种发展进程的逻辑依然是有意义的。整个世界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虽然各国的增长速度大不相同。印度和中国目前的年经济增长率分别约为 7% 和 10%。就目前而言，这些国家仍处在作为早期工业化标志的物质主义上升阶段。但是，如果它们按目前的轨迹继续发展，最终会达到一个阶段，其中较年轻的几代人在成长期可以视生存为不成问题。因此，中国民众开始显示出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代际转变，类似于已在西欧发生的转变。如图 3 所示，中国仍处在这个过程的最早期，但是我们看到了渐进的代际转变的迹象，较年轻的年龄群体在淡化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强调而日益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最年老的群体中足有 60% 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秉持者而只有 2% 的后物质主义者，即物质主义者与后物质主义者的达到了 30:1。而在最年轻的群体中，物质主义者虽然占多数，但比率变成只有 4.3:1。

当前整个世界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人能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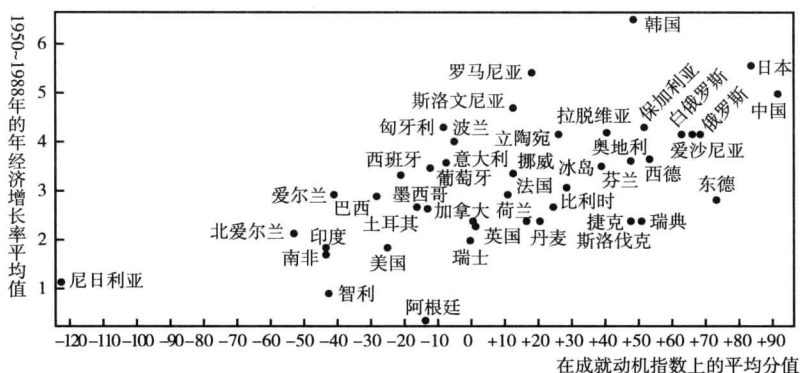


图3 2007年中国代际价值转变的开始

资料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

这种增长的持续，但只要是在那些取得较高生存安全水平的国家里，我们预期，代际价值观转变就会发生。

如这两本书所证明的，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本身只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型的一部分，该文化转型正在重塑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景观、宗教取向、性别角色以及性观念。新兴的态度取向较少强调传统文化规范，尤其是限制个人自我表现的规范。

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兴起带来了广泛范围内的基本社会规范的代际转变，从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文化规范到与追求个体幸福相关的规范。例如，较年轻的年龄群体明显地比他们的长辈更宽容同性恋。而且，他们对堕胎、离婚等非传统行为的态度也越来越宽容。为得到经济安全而进行经济积累是工业社会的中心目标，吊诡的是，实现这些目标却启动了一个渐进性的文化转变过程，从而使得它们的中心地位不再，而一度帮助取得这些目标的科层制度也正在被抛弃。

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与性别平等的上升趋势密切相关。在后工业发展阶段，性别平等的趋势成为现代化的一个中心点。固有的性别角色发生转型是与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上升相关的，导致了对人口多样化的愈加宽容以及多条战线上的反歧视运动。即使是今